

浙商研究系列

浙商

吕福新等著

的崛起与挑战

ZHESHANGDEJUEQIYUTIAOZHAN

——改革开放30年

创新，是浙商成长永恒的主题。

责任，是时代赋予浙商的历史使命。

改革30年中不断成长的浙商群体，已经成为人们解读浙江经济、浙江速度、浙江精神一个重要的缩影。



中国发展出版社

浙商研究系列

浙商的崛起与挑战

ZHESHANGDEJUEQIYUTIAOZHAN

——改革开放30年

吕福新等著



中国发展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浙商的崛起与挑战——改革开放 30 年/吕福新等著.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9. 1

(浙商研究系列)

ISBN 978 - 7 - 80234 - 308 - 5

I. 浙… II. 吕… III. 商业经营—研究—浙江省—
1978 ~ 2008 IV. F7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03763 号

书 名: 浙商的崛起与挑战——改革开放 30 年

著作责任者: 吕福新 等

出版发行: 中国发展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16 号 8 层 100037)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80234 - 308 - 5/F · 799

经 销 者: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源海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20 × 1000mm 1/16

印 张: 28. 25

字 数: 44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定 价: 56. 00 元

咨询电话: (010) 68990642 68990692

购书热线: (010) 68990682 68990686

网 址: <http://www.develpress.com.cn>

电子邮件: fazhanreader@163.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本社图书若有缺页、倒页, 请向发行部调换

序

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 30 周年之际，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中心主任吕福新教授及其团队，经过广泛的调查、深入的研究和反复的讨论，撰写了《浙商的崛起与挑战——改革开放 30 年》一书，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这一方面是用“浙商”这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兴起的最大的民商群体的实践经验和成就来纪念，另一方面是用自己的观察、调研和见解来纪念。

《浙商的崛起与挑战——改革开放 30 年》这个主题，选得好！这既是回顾和总结过去，充分肯定改革开放 30 年来的成就，又正视和关注现实，充分认识浙商在新形势下面临的挑战，为的是更好地走向未来，实现长期持续发展。纵观全书，这个特点很鲜明。

《浙商的崛起与挑战——改革开放 30 年》一书，充分体现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既有高度的理论概括，又有丰富的实践内容。本书把改革开放 30 年来浙商的崛起与挑战，高度地概括为“个众与公共的展开、冲突和协调”，这是一种新的理论概括。同时，既充分体现科学精神，也充分体现人文精神，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仔细地翻阅全书，处处体现客观和科学的态度，又时时体现人文的精神与情操，因而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所以，本书也可以看成是对改革开放 30 年的一种科学和人文纪念。

改革开放孕育了民营经济，发展了民营经济，培育了浙商，发展了浙商，浙商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中向前奔跑，不断超越，从一颗颗小草长成一棵棵大树，从一片片草地成长为一片片树林。站在 30 年的基础上，我们浙商应追求更高的发展境界。我个人的认识是，关键是要实现以下三个方面的提升与发展。

(1) 由“老板群体”向“企业家群体”提升与发展。浙商的认识、意识

和追求决定着企业的行为与能力，影响着浙江省经济社会的发展质量。视赚钱为第一目的还是视社会责任为己任，这是两种不同的追求境界，我们浙商群体要以社会责任为己任，要将企业看做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载体。

(2) 企业文化建设应由“功利的价值取向”向“责任文化”提升与发展。社会要宣扬与时俱进的“浙商”精神，引导企业摒弃逐利的价值取向，树立将人的发展与企业的发展和谐统一的价值理念，将企业的发展目标与社会的发展目标和谐统一，在全国乃至全球塑造有责任感的“浙商”品牌。

(3) 企业经营发展要由“浙江制造”向“浙江创造”提升与发展。智力、技术、品牌在竞争中的决定性作用日益凸显，而长期实施的低价竞争策略削弱了企业在技术、人力资源、品牌等要素上的投入。我们浙商要在创新文化、科技研发、队伍建设和品牌培育等方面实现新的突破，只有这样，“浙江创造”才有坚实的内在基础。

浙商的提升与发展是浙商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唯有浙商群体的提升与发展，才有浙江经济和浙江人经济的欣欣向荣。回顾过去的30年，人们不禁要问：下一个30年，浙商将走向何方？下一个30年，浙商将从草根浙商走向精英浙商，从功利浙商走向责任浙商，从经验浙商走向知识浙商，从个体浙商走向团队浙商，从家族浙商走向社会浙商，从模仿创业的浙商走向自主创新的浙商，从经济浙商走向人文浙商。

当前，全球经济危机正加速从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延伸，从发达国家向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扩散，影响程度之深、波及范围之广超出了预料，浙江省民营经济受到了一轮新的严峻挑战。不管形势如何变化，我始终相信：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浙商群体有智慧、有能力、有胆略直面挑战，有信心、有毅力、有决心化解危机，驾驭危机，在求新求变中迎来新一轮的大发展。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年的一个重要时点，我相信，《浙商的崛起与挑战——改革开放30年》一书的出版，必将对浙商群体今后的提升与发展产生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影响。

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席
传化集团董事长、浙商研究中心顾问

徐冠巨

2008年12月1日

目 录



第一章 概 论	1
第一节 传统文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	1
第二节 浙商“个众”的形成和发展	8
第三节 浙商“个众”的作为和影响	21
第四节 浙商“个众”的挑战和转型	34
第二章 浙商的历史文化	49
第一节 史前文化与越文化	49
第二节 浙江古代商业活动	55
第三节 浙江近代的三大商帮	62
第三章 浙商的兴起	71
第一节 休眠的激活	71
第二节 “八二”结构	74
第三节 相关的因素	79
第四章 浙商的成长	87
第一节 自发冲动和艰难生长（1978 ~ 1991 年）	87
第二节 政策支持和快速成长（1991 ~ 2002 年）	93
第三节 社会转型和趋于成熟（2002 ~ 2008 年）	98
第五章 浙商的企业制度	110
第一节 浙商企业制度演变的历史回顾	110

第二节	浙商企业制度现存的问题	119
第三节	浙商企业制度创新的若干对策	132
第六章	浙商的专业市场	137
第一节	专业市场的成长过程	137
第二节	专业市场的主体地位	143
第三节	专业市场的功能作用	151
第七章	浙商的产业集群	157
第一节	浙商集群化成长的历程	157
第二节	浙商集群化成长的历史逻辑	167
第三节	浙商集群化成长的挑战	173
第八章	浙商的商业模式	176
第一节	专业市场的价值实现模式	176
第二节	缘约网络的价值创造模式	183
第三节	龙头企业的价值整合模式	186
第四节	区域品牌的价值放大模式	191
第九章	浙商的政治参与和政策效度	197
第一节	浙商政治参与的发展历程	197
第二节	浙商政治参与的现实状况	198
第三节	浙商政治参与的社会功能	207
第四节	浙商政治参与的政策效度	211
第十章	浙商的法律行为与法制建设	219
第一节	浙商的法律行为	219
第二节	法律制度的演进	225
第三节	法制建设的提升	230
第十一章	浙商的社会责任	238
第一节	浙商承担社会责任的历史过程和现实状况	238

第二节	浙商承担社会责任的需要、内涵和层次	245
第三节	浙商推进企业社会责任的理念、组织和环境	250
第十二章	区域浙商的崛起和创造（上）	254
第一节	温 商	254
第二节	台 商	264
第三节	婺 商	277
第十三章	区域浙商的崛起和创造（中）	292
第一节	甬 商	292
第二节	越 商	305
第三节	杭 商	317
第十四章	区域浙商的崛起和创造（下）	331
第一节	广东浙商	331
第二节	海南浙商	340
第三节	天津浙商	356
第四节	中原浙商	366
第五节	北京浙商	374
第十五章	浙商的局限和挑战	388
第一节	浙商存在的局限	388
第二节	浙商面临的挑战	400
第十六章	浙商的转型与未来	407
第一节	“个众”向“合众”转型	407
第二节	创业型企业家向创新型企业转变	419
第三节	“边缘”向“主流”转变	428
后 记		441

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用张维迎的话说，回过头看，30 年前，当改革开始的时候，我们既没有预料到改革的路程如此漫长，也没有预料到改革的成就如此之大，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如此之快。按陈志武的观点，前 30 年主要证明了林毅夫的“后发优势”论，现在开始证明杨小凯的“后发劣势”论。我们从浙商的角度看，这 30 年，既是凸显浙商的崛起和创造，也是体现浙商存在的局限和面临的挑战，需要超越和转型，其历史与逻辑的主线是“个众与公共的展开、冲突和协调”。

第一节 传统文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

浙商迅速崛起成为中国最大的民商群体，既有文化传统的原因，也有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但无论是传统文化还是经济全球化都不是一维的，甚至包含矛盾和冲突，需要进行选择。

一、多元传统文化

1. 中国的自然、宗法、等级人伦传统

甘阳认为，应从新中国 60 年的整个历程来认识中国 1979 年以来的改革。共和国开国以来，毛泽东时代所形成的传统，主要是强调平等，是一个追求平等和正义的传统。还有，是中国文明数千年形成的文明传统，它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主要表现简单地讲就是注重人情乡情和家庭关系。^[1] 中国文化传统的主流是自然宗法等级人伦。^[2] 自然人伦包括天人关系，主要是“天人合一”思想。老子提出“天道”概念。天道即自然之道理，人应符合天道，也应帮助天下不足之人。自然人伦也包括人与人的关系，主要是亲缘伦理。宗法等级伦理主要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父慈子孝，兄友弟

恭，上下有别，长幼有序，夫妻和睦。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学说为核心，主要是“礼”、“仁”文化。“礼”主要是以制度和文化的形式规定和表达宗法等级人伦，但也有人情。孔子讲“仁者爱人”。“仁”是同情、关爱和慈善等。而“礼之用，和为贵”。仁义是“和”之本和体，“和”是仁义之末和用。自然宗法等级人伦包含矛盾，宗法等级体现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而人伦本是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所以儒家崇尚“中庸”与和谐。荀子也认为，人的本性和特点是“能群”。当然，中国传统文化也接受、吸收和同化来自外来文化的影响，主要是佛教文化，还有以个人为本位的追求“科学、民主、自由和博爱”的西方文化的影响。

2. 浙江的山海、中外、耕读、工商和义利并举的文化传统

浙江受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南宋时期，高宗赵构在杭州建都，杭州成为南宋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同时，孔子第四十八世孙袭封“衍圣公”的孔端友率族人随高宗赵构南迁，在衢州建有南宗孔庙。还有，南宋理学家朱熹等的思想也对浙江有一定影响。

但是，由于“春秋以前，浙江‘僻陋在夷’，民情物态与‘中原上国’大异其趣，与‘上国’亦未有特别重大的政治联系”^[3]。并且，浙江长期远离中央政权，受中央集权的控制和中国主流传统文化的影响较小。同时，由于浙江水乡和山区分散狭小的土地适合个体家庭的劳作方式，个体家庭意识比较强，个体主张比较普遍。加上，浙江的资源不足，人口密集度高，生存压力大，台风等自然灾害较多，培育了浙江人自强不息和顽强拼搏以及走南闯北的精神。再加上，浙江靠山临海，形成双重和多样的地理人文，既有山里人吃苦耐劳、顽强拼搏的韧劲，又有海边人勇于开拓、敢于冒险的胆略。但同时，又信奉自然天道和尊重天时规律，善于应变。所以，浙江人历史上在重农耕的同时，也重视工商业活动，有“百工之乡”的产业传统和商业发达的文化积淀，以及开展海外贸易的民间传统。浙江在唐代就已经是全国工商业发达的地区之一，杭州、宁波和温州均为繁荣的商业都市。两宋以来，浙江成为全国工商业的重要中心，丝织、制瓷、印刷和造船业等都居全国领先地位。人口超过百万的杭州不仅是南宋的都城，而且是当时全国最繁荣的商业城市。到了明代，杭州、湖州和温州等都是繁荣的商业大都市。到了近代，浙江商人尤其是湖州和宁波商人又大批走向上海，对上海成为中国乃至远东的经济、贸易、金融中心和国际大都市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浙江有悠久的对外开放历史。早在先秦时代，浙江就同东亚、南亚、西

亚等不少地区以及国内沿海地区有贸易往来。杭州和宁波等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和桥头堡。^[4]北宋时期，杭州、宁波、温州都是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浙江盛产的丝绸、茶叶、瓷器等都是当时中国的主要出口产品。元代时，全国设七处对外贸易主管机构，浙江占有四处。鸦片战争后，宁波、温州、杭州相继被辟为通商口岸。近代以来，浙江人更是处于中西通汇前沿，得风气之先。近代工商业的兴起，新式教育的开办，西方文化的传播，都使浙江人较早和较多地接触西方文化，开阔了视野，培育出了乐于接受新事物和博采众长的开放心态。^[5]这样，也就形成经济“根植与远征”的文化传统。^[6]

历史上，浙江孕育出了门类齐全的手工业，培养出成千上万的能工巧匠。有著名的宁波的裁缝、东阳的泥水木匠、永康的铁匠、义乌的麦芽糖艺人、台州的绣花女、温州的皮鞋匠、永嘉的弹棉花郎，等等。浙江历史上，还形成许多商人群体和商人组织。明清以来，浙江商人的行会和同乡会等民间组织十分发达。龙游帮、宁波帮和南浔商帮等知名度很高。义乌的“敲糖帮”有着细密的组织系统和广泛的联系网络。

正是基于和反映丰富的民间文化传统，浙江历史上的学术思想文化传统也是重实务、讲事功、倡实践，主张“义利并举”和“工商兼本”。如永康学派的代表人物陈亮强调“功到成处，便是德；事到济处，便有理”。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叶适主张“以利和义”、“义利并立”。心学大师王阳明大力倡导“四民平等”的新观念。明末启蒙思想家黄宗羲率先提出“工商兼本”的新思想。而且，浙江民间百姓历来就重视读书和教育，“耕读传家”，尊师重教。此外，浙江历史上书院兴盛，私塾众多。

二、经济全球化及其多元化

1. 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内涵

经济全球化从国际贸易中萌生，起源于“地理大发现”所引发的欧洲“商业革命”。它使人类的商业活动第一次具有全球性，首次使经济活动与广阔的世界市场联系起来。从“地理大发现”到欧洲工业革命，是经济全球化的萌芽期，它的主要特征是商业资本进入国际循环。而经济全球化的确立，是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欧洲各国先后发生工业革命，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终确立。因为从本质上说，经济全球化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联系在一起。欧美各国凭借工业革命带来的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向世界各国进行急剧的殖民扩张，把殖民地变成自己的商品出口市场和原料产

地，使经济全球化得以强制扩展。在殖民扩张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特征是借贷资本进入国际循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地国家纷纷摆脱殖民统治，新兴民族国家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实现国家工业化。但是，多数发展中国家并没有也不能摆脱西方的经济控制。所以，新兴民族国家的工业化大多被纳入资本国际循环的轨道。即使是那些走上自主工业化道路的新兴民族国家，也由于计划体制难以长期支撑工业化，因而不得不实行市场化，并进入由资本主导和控制的经济全球化，以及产业资本的国际循环。这也就引发了西方发达国家产业资本的大规模跨国运动，扩大和深化资本的国际循环和周转。^[7]

同时，与经济全球化相联系的是世界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技术和制度的发展。世界人均 GDP 从 1870 年、1880 年左右开始腾飞，到 1973 年增长了 3 倍多。特别是从二战结束后的 1950 ~ 1973 年，世界人均 GDP 总共翻了一倍多。同时，世界在工业技术、通讯运输技术和全球贸易秩序等方面也快速发展。^[8]

2. 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和特性

经济全球化不只是产品贸易的全球化，除劳动力外的要素流动或配置的全球化，也是生产过程和产业组织的全球化，更是资本运动的全球化。房宁说，无论是最表象化的商品及消费活动的全球化，还是生产跨越国界、资源全球配置，其背后的动因都是资本运动，是资本增值的扩张性运动带来的。因此，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的全球化，是资本国际循环的建立。资本国际大循环中的资本积累与不平等交换是造成当今世界范围内严重的贫富分化与南北差距的根本原因，如今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陷入了贫困的泥潭。^[9]联合国前任秘书长布特罗斯·加利先生在纪念联合国成立 50 周年大会的致辞中指出，全球一体化与全球分裂化是人类在 21 世纪面临的主要挑战。

经济全球化还包含和体现文化的特性。马丁·沃尔夫在其发表在英国《金融时报》上的题为《选择总统意味着什么》的文章中说，我们生活的世界是美国人，更准确地说，是盎格鲁—亚美利加体系创造的。美国外交学会的沃尔特·鲁塞尔·米德认为，如今的美国属于一个传统的全球权力体系，这个体系起源于 17 世纪的荷兰，18 ~ 19 世纪在英国得到发展，在 20 世纪由美国传承。这就是盎格鲁—亚美利加体系。盎格鲁—亚美利加体系有三个主要特征：一是海洋性的；二是全球化的；三是由商业和军事实力共同组成。盎格鲁—亚美利加体系拥有独特的文化：它文明却好斗；重商而有操守；信奉个人主义却有组织；充满理想主义却冷酷无情。对敌人而言，这一体系残

酷、肤浅且伪善；而对朋友来说，它是自由和民主之源。该体系推翻了许多强大的敌人，包括西班牙帝国、法兰西王国和法兰西帝国、德意志帝国及纳粹德国、日本军国主义，以及社会主义苏联。这一体系还推翻了印度的莫卧儿王朝、日本的幕府统治，并间接摧毁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甚至是中国文明，这些最伟大的文明都被彻底打败。这一体系以及被这一体系改变的世界在 21 世纪会走向何方呢？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目前世界大部分国家都被纳入市场经济体制以及市场经济带来的全球化浪潮中。如今这种趋势正在改变两个大国：中国和印度。结果，美国经济开始相对衰退。其次，在未来 25 年，美国仍将是世界最强大、科技最发达、经济最富创新性的国家。它还将拥有全球军事主导权，继续维持其世界霸主地位。再次，奥巴马和麦凯恩都秉承盎格鲁—亚美利加体系的传统。他们都笃信美国注定是世界强国，也相信这将为世人带来好处。不过，他们也代表了盎格鲁—亚美利加传统中的不同方面：冲突的本能和合作的本能。第一种本能是去树敌，第二种本能是达成协议；第一种本能是与敌人坚决对立，第二种本能则是互相妥协。^[10]这种特有的文化，使经济全球化表现为特殊的方式和产生特殊的影响。

3. 多元化的全球化及其公共性

秦晖在《多元化的全球化》的文章中说，今天，在“地球村”中各种因素都在“全球化”。真正的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全要素流动的全球化。而今天的全球化主要是贸易自由化，其次是投资自由化，而信息的自由化就差得多，至于自由移民不仅基本上无进展，而且很多国家的移民限制还强化了。因为移民自由要求“政治全球化”。比政治全球化更为滞后的则是公益的全球化。^[11]

袁祖社说，进入 21 世纪以后的“新全球化时代”，本质上是一个“公共性”的实践与反思的时代。对现代社会的各种“公共性危机”、文化和价值“公共性丧失”的总体关怀，凸显了“公共”、“公共性”、“公共领域”、“公共理性”、“公共文化”、“公共价值”、“公共精神”。公共性问题的触角几乎伸展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文化全球化与经济全球化相携并行。文化全球化意味着民族国家作为文化单位之间互统性、互文性、互释性和互约性的急剧拓展，直到能够形成一套公共性话语。这意味着人类整体除了“人群性文化自在方式”以外，还广泛地成长出“类存在意义上的普遍性自为方式”和自为准则。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既肯定意识形态的差异并继续延伸其差

异面，又会迅速出现叠合面并跨越边界限制的“在场化”。^[12]西方在个人本位的基础上，通过竞争而产生大量的矛盾、冲突和危机，如环境污染等市场外部性和公共性问题，同时也产生通过协商和合作的方式解决公共性问题的要求和某些条件。

三、中国和浙商的选择

1. 对全球化的选择

全球化是一种客观趋势，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和浙商必须而且只能适应，而无从选择。但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也存在全球分裂化和反全球化，这就为选择提供了客观的可能性与条件。张文木认为，由于全球化的本质是资本的全球化，所以社会必然出现两极分化，代表资本的“精英”日益进入社会的主流，而提供剩余价值的另一方人数日益增多并被边缘化。这便成了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及其历史运动的社会基础。同时，全球化也会形成和区分资本中心与资本外围。公平屈服于效率，继而人权屈服于资本是资本全球化的症结。南方反对北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反对霸权国家的斗争是矫正全球化进程中效率与公平、资本与人的异化关系并使其向健康方向发展的伟大杠杆。社会主义，在相当意义上说，就是在保证人类民族特性的基础上实现人类生产资料及生产关系社会化的主义，其作用本质上是在继承全球化和反全球化运动正面成果基础上对它们二者的负面作用的制约和扬弃。社会主义要求确立人，确切地说是劳动者，而不是资本在全球化历史进程中的主体地位。^[13]这反映了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做的选择。但是，今天的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实力还不够强，还不能也难以抵制国际资本，而需要甚至更多的是在顺应和利用国际资本及其全球化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借助反全球化的正面作用，促使和利用全球多元化和世界多极化，控制和减少全球化和国际资本的负面作用。不仅避免被全球化浪潮冲向边缘，被全球分裂化的浊浪所吞没，而且逐步确立和加强在全球化中的地位与作用。浙商作为中国最大的民商群体，普遍以个私所有为基础，既是资本的所有者，又是企业的经营者，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更要做出面对全球化的选择。

2. 对传统文化的选择

中国和浙江的传统文化，一方面是浙商的文化基因，也是其生命基因，是自然继承和不可选择的；另一方面又是构成和影响浙商的生存环境的因素，是可以有所选择和改变的。另外，浙商不仅为市场和经济主体，而且也是社

会和文化主体，可以发挥积极和自主的作用，可以而且应该对传统文化有所选择并施加影响。中国主要是人文传统，而人文具有“自我实现性”。美国社会学家默顿，将如有人散布谣言说某银行即将破产，于是公众受其影响而纷纷到银行提款，最终导致银行真的破产这种现象称为“自我实现的预言”。人的可诱导性造成了人文知识的塑造力。虽然这种塑造力可能导致人们陷入事后真理的圈套，但同时也具备创造未来的功能，因此可以积极利用人文知识的塑造力将人的行为和人际关系导向美好。^[14]中国的传统文化，既存在着与现代化和全球化不相适应甚至是根本对立的内容，主要是宗法等级人伦，也具有与现代化和全球化相适应的一面，主要是“天人合一”与和谐的思想。浙江的山海、中外、耕读、工商和义利并举的传统文化基本适合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要求，但是也有一个选择问题，主要是结构性的选择和重组。

3. 转型过程中的选择

中国经济和社会处于转型中，需要浙商在经济和社会转型中进行选择。中国经济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以及从传统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型中。中国社会也处在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钱颖一认为，现代市场经济与传统市场经济有两点本质差别，第一，虽然现货交易和人格化交易仍然在相当的范围内进行，但“非人格化交易”成为重要的交易方式，需要第三方（通常是政府）来公平地执行合同；第二，虽然政治与经济仍然密切相关，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变成了“保持距离型”。^[15]中国社会转型浓缩了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重大变革，它超越了常规的社会变迁，具有文明转折的意涵。^[16]这包括从官治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变。中国社会转型所依据的理论被概括为两种，一种是“文化特异性路径”。它强调文化特异性对社会转型的影响，造成社会转型的路径依赖，因为文化体现在特定社群的社会行动中，或“文化在社会互动中”。^[17]另一种是“稳态社会路径”。它以北美社会为模仿和复制的标准，因为北美社会已经是高度稳态的程序社会。方文认为，“群体资格”已在中国主流社会学研究中兴起，如费孝通先生有关“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和“文化自觉”的思想，已经深刻地关涉民族成员资格和文化共同体的成员资格问题。社会转型心理学应“以群体资格”为核心。社会转型包括和引起社会分类体制的改变，每个个体会受这个分类体制的影响，生长在特定的文化共同体、政治共同体甚至是宗教共同体当中，被打上烙印，获得这些共同体的群体成员资格，并通过终身不懈地努力，缔造自身独特的

“多元一体”的完整生命。^[18]浙商就面临这样的选择，既不可能摆脱文化特异性路径依赖和影响，也需要吸收和借鉴稳态社会的经验，更需要选择和形成自己的群体资格，最终缔造自身独特的“多元一体”的完整生命。

4. 客观的基础、条件和环境

浙江全省陆地面积为 10.18 万平方千米，为中国陆地面积的 1.06%，是中国最小的省份之一。其中山地丘陵占了 70.4%，平原和盆地占 23.2%，河流湖泊占 6.4%，即所谓“七山一水二分田”。人均耕地面积 0.55 亩，人多地少问题非常突出。这不仅练就了浙江人勤奋努力、坚忍不拔、务实创新的品质和特性，以及精耕细作的习惯，而且迫使浙江人跳出农业，走出家门，实行经济远征，寻求新的生计，同时也使浙江产品多样化，异地贸易和交换很有价值，使众多的浙江人经商和办企业具有坚实和丰富的地理人文基础与条件。

同时，浙江缺铁、缺煤、缺油，缺大宗工业原料。从国家统计局颁布的 45 种矿产工业储量潜在价值看，浙江仅为 55.7 亿元，占全国比重仅为 0.09%。人均资源量指数以全国平均数为 100，浙江的能源为 0.5，矿产为 4.9，综合指数为全国倒数第三。^[19]这是使浙江人办工业不能主要靠自己的资源，而必须广泛地开发和利用外地资源，通过广泛的商品交换来兴办工业，把工商业活动开展到浙江以外的地方去的地理经济基础。

还有，浙江地处国防前线和缺乏重工业原料等原因，国家对浙江的投资很少。从固定资产的投资看，1952~1978 年，浙江人均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额只有 411 元，处于全国各省份最后一位。这导致浙江国有经济很弱，数量少，规模小。即使是改革开放以后，浙江也不是国家投资的重点地区，1979~1992 年，浙江的国家投资人均 1723 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3/4，列全国各省市第 22 位，而温州、丽水、金华等地区的国家投资水平更低。^[20]浙江这种薄弱的国有经济基础，也使国家对浙江的计划控制比较薄弱，政府对老百姓的行政干预较少。

第二节 浙商“个众”的形成和发展

在中国传统文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浙商的崛起既是百姓的自发倾向和行为，也是政府反映民众的意愿和要求而放松管制，允许百姓经商创业，

并制定和实施鼓励与约束政策，是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互动的结果。人数众多的浙商在政策的允许和约束下自发自为，不仅确立和增进自己的财产所有权，把企业做大，而且亲朋相拥和老乡相随，形成个人独立和大众自主与和合的“个众”特性，并且出现个人化、关系化和类别化的发展。浙商的形成和发展典型地反映和体现循着超越自然历史进程的规律与要求。

一、自发与自觉及其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

1. 自发和自下而上

具有自利本能又较少受约束的浙江农民和普通老百姓，自发地要求并采取便利和有效的方式获得物质利益，特别是在吃不饱和穿不暖的年代，本能的生存需要和冲动很强烈，并意识到经商和办企业是获得物质利益和积累资本最有效的方式。这种自发的要求和行动，在浙江深厚的传统和肥沃的土壤中一直生存着，并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如雨后天春笋般涌现。早在所有制改造结束后不久和“大跃进”开始之前的1957年，永嘉县就出现了包田到户。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温州人就没有停止过非农产业活动，320国道永嘉桥头地段的路边还出现了许多小商小贩。在政策稍微宽松和允许的情况下，浙江人更是自发行动，利用和发挥自己有限的条件，做自己做得了和做得好的小事甚至是别人看不起的“贱事”，务实和有效地开始经商创业。“柳市八大王”，是1978年之后温州最早的民间商人。他们分别是：螺丝大王刘大源、五金大王胡金林、目录大王叶建华、线圈大王郑祥青、矿灯大王程步青、供销大王李方平、机电大王郑元忠、旧货大王王迈仟。他们成了柳市乃至温州最早富裕起来的个体经营者的代表。机电大王郑元忠回忆说：“我从小胆子就非常大，出生在柳市的农村，初中没念完就赶上‘文革’，回家当了社员。柳市人多地少，当时我就想：任你怎样‘学大寨’怎样‘战天斗地’，只搞农业是永远挣扎不出贫穷的烂泥塘的。所以一有机会，我就搞些小作坊，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就成了‘万元户’。后来发现低压电器利润大，我就办了一个低压电器小工厂。几年时间竟挣了十几万元，一下子成了温州的电器大王。”温州农民用“五把刀子”（剪刀、劈刀、剃刀、螺丝刀和菜刀），从事和开展缝绉业、皮革业、理发业、修理业和餐饮业，还有擦皮鞋等，赚到“第一桶金”。绍兴农民是从酒缸、酱缸和染缸等“三缸”开始创业经商的。台州农民则从“两水一加”（水产、水果和加工）开始经商创业。义乌人从“鸡毛换糖”起步，东阳人做泥水工，永康人当铁匠。丽水和舟山做